武汉封城日记 | 第二十三天

原创 阑夕 阑夕

据说武汉本来计划今起全面复工,又临时发了一份文件推后到下周了。

显而易见,当下的情形完全没有达到复工的条件,但是挤牙膏式的延迟,又透露出对于经济需求的不舍,于是陷入两难境地。

本地的企业同样战战兢兢,不少都在催促员工恢复上班,但是聚集产生的感染和传播,搞不好要由自己买单,风险大到难以承受。

这段时间里,西贝的贾国龙和魅KTV的吴海出来喊话,为企业家谋得了不少关注,主要都是呼吁为失去现金流的企业减负。

通常也是只有到了这个节骨眼上,人们才意识到经营企业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,每一笔成本都是负债,偿还不起就会破产。

贾国龙如愿以偿的拿到了特事特办的银行贷款,吴海有着曾与总理写信的光环加持,想必也会获得不错的下文,但是举国上下面临沉重压力的企业,又何止是这两家。

不能总是只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

还有一个普遍较大的意见是,各地政策都对企业社保支出调整为延迟扣缴而非减免,这实际上没有起到分担压力的作用,也不太吻合特殊时期的做法。

在史无前例的漫长假期里,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倒是也许变好了一些,员工也害怕这么无休止的停工下去,终有一天会把公司给停没了,身处同一个战壕里的共生感,消弭了曾被视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二元结构。

打趣的说,在某种意义上,新冠肺炎扮演了曼哈顿博士的角色,是它促成了谅解和团结的降临。

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,则在匮乏年代抒发无处消费的失落,在一则关于「疫情期间你最想念谁」的投票里,票数高居第一的答案你们可能想象不到,是「保洁/家政阿姨」……

就像投票背后一片狼藉的卧室和客厅,有太多的人被这样打乱了生活,矫饰也好,软弱也好,都不过是出于对正常秩序的向往,就像是两个月之前,大家在憧憬辞旧迎新的时候所享受的一切。

兵荒马乱, 咫尺天涯。

我记得德鲁克在说如何体验时代感时举了一个例子,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也就是自己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,就当上了欧洲一家著名日报社的助理总编。

德鲁克说:「我得到提拔,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出色,而是因为本该出任这些职位的人,也就是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记者,在欧洲很难找到,他们大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在了战场上,于是,即便是一些位高权重的职务,也只好由我这样的年轻人来担任。」

这又让我想起,有人在那条关于武汉高龄老人染病无助跳楼自杀的新闻底下评论,说这意味着什么呢,意味着他这一辈子,经历了我们这些人难以想象的苦难,抗战、反右、文革、饥荒,都扛过来了,然后在耄耋之年,忍受不了绝望求死。

这才让人心痛。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,第二十三天。